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在上海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金立人 李华明 李小苏 著

5.51
5

上海远东出版社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上海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著
金立人 李华明 李小苏

上海远东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4 号

责任编辑 徐林林

装帧设计 周亚平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上海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著

金立人 李华明 李小书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冠生园路393号 邮政编码 200233)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6.5 字数 170,000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80514-993-3/D·44 定价: 8.50 元

序

(一)

王尧山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是在不断纠正“左”的错误，并使党的正确路线取得全党的拥护、坚决贯彻执行，然后取得胜利的。其主要标志就是遵义会议开始纠正了王明的“左”的军事路线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由此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以后又通过延安整风，纠正王明一系列“左”倾错误，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列。但是整个革命的进程是相当艰巨复杂的。在第一次人民大革命迅速发展的时候，由于同盟者国民党背信弃义，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由于在共产党内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而失败了。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吓倒，高举革命大旗，进行武装抵抗，克服了右倾错误，使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又取得了新的发展。但由于从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特别是1930年6月，党内发生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到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以新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又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统治地位，并持续了4年之久，因此而使中国革命遭受了

严重损失。

王明靠着搬用马列主义的某些词句吓唬人，在共产国际来我国的代表的支持下上了台。以王明为代表的那套“左”的东西，完全脱离中国的实际，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对于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而是反对以农村包围城市等一系列正确政策；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党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的“左”的错误路线、错误政策，使逐渐壮大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到极大损失。

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确定了从城市转向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广大同志也在探索城市斗争中的正确策略。但是，由于“左”的思想占上风，正确的实践受到严重的打击和阻挠，特别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把我们党在农村中建立起来的大部分革命根据地搞垮了，出现了1934年的失败，开始了红军的长征。城市中的革命斗争，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严密控制和镇压下，我们的主要方针应以防御为主，尽量利用合法与非法的斗争相结合，公开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策略，使党的组织深入群众，长期荫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到农村去发展农村武装斗争力量，借此以配合农村斗争，推进革命形势。可是王明“左”倾路线仍然以城市的工人斗争为中心，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妄图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的到来。

王明“左”倾错误危害极大，但是错误还是由我们党自己来纠正，是毛泽东思想纠正王明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是毛泽东思想创造出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建设有纪律的、马克

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采取自我批评的、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党，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三大法宝，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金立人、李华明、李小苏撰写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上海》，着重说明了“左”倾的危害，党内同王明路线的斗争。它所提供的王明“左”倾错误在上海造成的严重损失，会更加提高我们对“左”倾错误危害性的认识，对防“左”反“左”是很有意义的。

序

(二)

周尚文 唐培吉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右的和“左”的两种倾向都曾给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无情的史实表明：“左”的危害决不比右的危害小。在民主革命时期，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全党统治长达四年之久，使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组织损失更大，把党和红军推向危亡的绝境。这一切，党已经作出了明确的结论。然而，如何运用这些沉痛的、用千万名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教训告诫后人，避免重蹈覆辙，仍然是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问题。从我们在社会主义时期四十多年走过的道路看，“左”的错误时而出现，成为较长时间内的主要倾向，又一次把党和国家推向危亡的边缘。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提供一面历史的镜子，提高人们对“左”的错误倾向和错误路线的鉴别能力和抵御能力，应该有所启迪，有所帮助。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所以能猖獗一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方式遍及城乡各个角落，由此滋生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也渗入社会各个阶层。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地主、反动军阀的暴虐统治，驱使大批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卷进革命的洪流。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包括农民在内的小生产者占人口的大多数，当他们在严酷的反动统治下起来反抗的时候，迸发出巨大的革命热能，同时又带来小资产阶级思潮，平均主义、冒险主义、无政府

主义、禁欲主义等等都是它的特征。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潮反映到革命队伍中来，会自觉不自觉地包围、侵袭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肌体，并在共产党内找到自己的代言人和代表。本书叙述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种种表现，诸如盲目强调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主张无节制的“进攻”策略，以夺取中心城市为标志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同资本主义世界作“最后决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无视中国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主张使革命队伍“纯而又纯”，把中间势力看作最危险的敌人，排斥和拒绝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大城市，大搞“飞行集会”一类盲动做法；在党内搞无情斗争，以图从根本上“改造党”……这一切，虽然与当时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有关，但王明一伙不了解也不研究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终于使“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的劫难。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广泛存在，这不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共产党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植根在现实的土壤上，党会受到各种思潮、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这也是不足为怪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能不能坚持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防止和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队伍的侵袭，及时防范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党对革命事业可能带来的危害。小资产阶级思想是客观存在的，至于小资产阶级思想会不会泛滥并造成实际的危害，则是另一回事，应该从党的自身建设中去总结经验教训。为什么在三十年代同样的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前期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给党、给革命造成如此巨大的危害，而后期则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和代表的正确的革命路线，坚强的领导集体和优良的党的作风，革命形势迅速好转。两者的差别是何等明显。

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经验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包围和侵袭的危险同样

存在，如果不注意加以防范，也会带来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的“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以及十年“文革”期间种种“左”的倾向泛滥，就是有力的例证。这些错误，从思想根源上看，是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片面性取代了唯物辩证法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华而不实、好走极端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这种由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而造成的“左”的错误，又由于党内不适当地开展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而更加严重起来。于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批右，不批“左”。这样，就无异于对小资产阶级的“左”的倾向加以鼓励和纵容，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当作无产阶级革命性加以保护和颂扬，使得小资产阶级思想畅行无阻地蔓延开来。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我们这样一个原先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固然要警惕右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更要防止和克服“左”的错误倾向。那种轻视发展生产力，认为在落后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也可以在短时期内建成社会主义，把各族人民逐渐富裕起来和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统统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以及鄙弃科学文化，糟蹋知识，都是“左”的思想的表现。其结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被歪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被损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遭受挫折。邓小平同志在前不久南巡时的谈话中指出：“‘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段话蕴含着多少深沉的历史教训。金立人、李华明、李小苏同志编著的这本书所提供的史料价值，就在于印证了这方面的历史教训。

目 录

引 言	(1)
在莫斯科反中共代表团	(5)
初到上海时的错误言行	(12)
以冒险主义反立三路线	(28)
宗派活动反对三中全会	(37)
四中全会王明进政治局	(51)
王明冒险主义政治纲领	(62)
“反右倾”、“改造党”、打击干部	(80)
领导反日运动中的错误	(95)
重提夺取大城市的盲动	(106)
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	(118)
学生运动中的关门主义	(137)
各类团体中的关门主义	(147)
盲目发展党员，涣散组织	(156)
上海党组织遭严重破坏	(174)
结束语	(185)
后 记	(192)

引 言

王明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很快就成了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统治达4年之久。

上海是王明推行“左”倾错误路线的重要据点。王明于1929年3月从苏联回国，就到了上海，在上海活动了2年7个月。1931年1月，担任中共江南省委（不久即改为江苏省委）书记，直接控制着上海党的工作。未几，到了中央，掌握了中央领导权，对上海的工作依然是控制的重点。这年11月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到达莫斯科，中共临时中央由秦邦宪（博古）负总责。王明则在共产国际“负责中国党的事情”，继续控制着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

王明是趁党中央纠正李立三的错误路线的时机，进行宗派活动，反对党的三中全会而上台的。立三路线的错误是“左”倾盲动、冒险的错误，而王明抨击“李立三路线是形式上以‘左’倾空谈掩盖着右倾消极的投降内容底路线”，称立三路线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因此，王明对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高潮与低潮，革命的策略，党的建设和党内斗争，提出了一整套主张，构成了王明的路线。当然不是说这一切都是王明的创造发明，但是各种观点、主张，经王明的选择、集中，又有他的解释、发挥，用之于当时中国革命的。虽然部分地说，似乎没有如

李立三那样要在全中国大城市组织起义、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举动，但从整体看，它却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火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王明的错误路线，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造成巨大损失。在王明直接控制下的上海党组织和上海的革命斗争，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灾难。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随着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逐步克服王明路线在各方面的错误，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革命得到发展，得到胜利。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王明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性质是“左”倾冒险主义，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可是王明始终以正确路线代表自居，至死还标榜自己是“一贯正确”，“为马列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的战士”，反诬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事情并不奇怪，站在“左”的错误立场上看事物，凡不及它的“左”，也就成了右。那么正确的路线，必然被认为是右倾了。

关于右倾和“左”倾，有科学的、明确的含义，决不是随意使用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此讲得最为透彻。他说：

“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①

对于“左”倾冒险主义，毛泽东说：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横排本），第271～272页。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①

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有其共同点，“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但是它们的具体含义是不相同的，不能混淆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发生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那就是大革命期间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也发生过几次“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其中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最为系统，历时也最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右的错误对革命造成巨大损失，而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左”的错误造成的危害，并不小于右的错误造成的危害，它同样要酿成葬送革命前途、毁灭革命队伍的险境。越“左”越革命，“左”总比右好的论点是错误的。这种极左的东西是主观主义的产物，它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和青年，但是它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

在四十年代，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②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是教条主义的产物，从其后果看，确确实实反映了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工人阶级的大敌，人民的大敌，民族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横排本），第271～272页。

② 同上书，第三卷，第758页。

的大敌。

本书集中记述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形成，怎样在中国共产党内取得统治地位，王明路线在上海的种种表现及其造成的危害。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的这段历史，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何等不容易，又是何等的重要。

在莫斯科反中共代表团

王明和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所以能在中国共产党内取得统治，离不开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经历。

王明原名陈绍禹，后改为陈绍禹。1904年4月生在安徽六安县金家寨（现属金寨县）。1924年8月进武汉商科大学预科学习。1925年参加武汉地区响应五卅运动的斗争，表现积极，这年9月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由组织保送他赴苏联学习。11月，由武汉经上海到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

在中山大学，王明先是编入第一班，后选进速成班。速成班教授列宁主义课程的教员是该校副校长米夫。王明专门在俄语和米夫所教的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两门课下功夫，记名词术语，背诵结论；班上发言、写墙报文章，都吻合米夫的意图，受到米夫的青睐。

1926年夏，中山大学发生了中共党员党籍归属问题的争论。起初，在中山大学、东方大学等校学习的中共党员，既没有取得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党籍，联共（布）支部局也不承认中共党员的党籍。因此，在苏联学习的中共党员成立了中共旅莫支部，中山大学的中共党员建立支部的分部，归东方大学旅莫支部领导。米夫对旅莫支部不满，于是发生了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党组织归谁领导的争论，持续了4天。争论中，王明按照米夫的意图，力排众议，提出归联共莫斯科市中山大学所在的区委领导。这意见当然为米夫赞赏。中山大学宣布解散校内中共旅莫支部的分部，所有中共党员都变为联共（布）的候补党员。王明更受米

夫器重，这年9月，王明当上了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

1927年3月，米夫受命率领联共（布）宣传工作者代表团来华，配备4名翻译，王明是其中之一。4人中，潘克鲁是主要翻译，王明分工共青团方面的翻译。王明就在米夫面前诽谤潘克鲁，终于取而代之。

王明随米夫先到广州，其时正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于是他们很快到了上海，由米夫向中国党介绍联共（布）党务工作的经验，并了解上海革命的情况；之后转到武汉。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王明随米夫列席。米夫向陈独秀推荐王明主持中央宣传工作，陈独秀没有同意，只安排王明在中宣部当一名干事，参加党刊编辑。7月初，武汉的汪精卫日益反动，形势险恶，加上主持中宣部工作的愿望未遂，王明就随米夫回莫斯科。

米夫和王明在1927年8月回到莫斯科。在他们到中国的半年里，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内发生了重大斗争。1927年5月英国保守党政府宣布与苏联绝交并断绝商务关系，6月，苏联驻波兰大使被刺死，苏驻德国、中国的使馆、商务机构多处受袭击。当国际上一股反苏浪潮冲击苏联时，在1926年被批判过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又提出了“八十三人政纲”，对联共党的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路线提出另一套纲领，涉及党的统一还是分裂。他们把政纲散布到党员中去，要求举行全党争论。联共（布）党内的斗争直接影响到中山大学学生之间的矛盾。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联共（布）中央把拉狄克的校长职务免去了。那时副校长米夫不在苏联，便任命中山大学的教务主任阿古尔为代理校长。这个人事变动引起了学校内重大分歧，一方是支持阿古尔的学生，一方是支持学校的联共（布）支部局反对阿古尔的学生。双方在学期结束的总结会上爆发了争论，一方批评教务工作杂乱无章，一方批评支部局的工作一塌糊涂。双方各

执一词，争了七天七夜。还有一批学生厌倦这样的争论，不愿介入，成了所谓“第三势力”。

米夫、王明回到中山大学，正在这场争论之后。王明向米夫建议：依靠支持支部局的学生，团结“第三势力”，搞垮代理校长阿古尔及其支持者。王明的建议为米夫所采纳，付诸行动。结果，阿古尔被免职，米夫不久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很快又委以重任，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经过中山大学这场争斗，米夫格外器重王明，如同王明一起的盛忠亮（盛岳）所说：“陈绍禹在这场运动中是积极的组织者之一，成了米夫的主要心腹”。^①王明担任了中山大学支部局的宣传干事，实际控制了支部局。

1927年10月，联共（布）全党展开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反对派的政纲的论争，绝大多数党员和党组织反对和谴责这个政纲。于是，托季联盟在十月革命节例行的纪念集会、示威游行的同时，拉起了一支小队伍，举行与联共（布）中央公开对立的抗议示威。这支队伍当然被全民示威队伍冲垮撵走。1927年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开除拉狄克等一批托派重要成员，全党开展反托派斗争。在苏联的这场斗争中，也有留苏的中国学生卷了进去，在十月革命节的游行中，有个别中国留学生站在托派一边，还喊了口号，因此，留苏的中国学生中也开展了反托派斗争。

中山大学的反托派斗争由支部局掌握，王明凭借在支部局的实权，乘机进行宗派活动，打击异己，将反托派斗争扩大化。王明的作为，引起许多同学的不满和反对。王明对那些反对他而与托派没有牵连的同学，捕风捉影，捏造罪名，进行打击。对一些

①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27页。